

家庭自主性与农民城市化的实践类型^{*}

卢青青

(武汉大学社会学院, 武汉 430072)

摘 要: 本文将农民作为城市化自为主体,立足实践经验,从家庭自主性视角建构农民城市化的实践类型,丰富和拓展农民城市化研究。基于农民城市化意愿及其能力的双重分析,发现以阶层流动为目标的发展型家庭进城意愿较高,其中在进城能力较强的长三角发达地区农民实现的是完全城市化,而在能力次之的江汉平原、华北平原农业型村庄则只实现了半城市化;以社会生活为目标的生活型家庭进城意愿较低,其中珠三角发达地区农民在半工半租的村庄福利笼罩下具有典型的逆城市化倾向,而西南边陲地区在城市化意愿和能力都较低的情况下,农民融于日常生活而表现为去城市化。中国的城市化发展存在客观的区域差异,要分类施策,同时也要重视农民家庭在城市化中的关键角色。

关键词: 家庭自主性; 城市化意愿; 城市化能力; 区域差异

国家统计局最新数据显示,截止 2018 年底全国人口 13.95 亿,其中城镇化率近 59.6%^①,城镇人口已经远超农村人口,且预计到 2035 年中国城

镇化率将达到 70% 以上^②。伴随着经济的飞速发展,城镇化不断攀升,成为中国社会快速转型的重要标志,也亟待学界进行持续性地深入研究。

一、文献梳理与问题的提出

当前学界对农民城市化的研究相对较多,争议也较大。农民城市化是农民转变为市民的过程,其不仅包括居住空间的城市化、社会身份及职业的非农化,也包括农民的角色意识、思想观念乃至生产生活方式的转化,是农民市民化的过程(文军, 2004)。在此意义上,城市化是“人的城市化”,尤其是相较于土地城市化导致的用地过度扩张和整体福利下降,人的城市化才是根本取向(张耀宇等, 2016)。但是如何实现人的城市化学界争议颇大。

有一种观点将人的城市化作为既定事实,农民

市民化问题由此被归咎于体制、制度问题,导致农民无法被有机整合进城市的经济社会文化系统中,真正实现市民化。由此,学者发现当前的农民市民化多是介于农村和城市之间的“半城市化”状态,具体表现在各个系统的不衔接、社会生活的不融合以及社会认同的“内卷化”(王春光, 2006)。针对此问题,一些学者提出应从当前城乡二元社会体制的户籍制度和土地制度入手,实行土地流转和户籍制度的松绑性改革,破除制度性屏障,加快城乡人口流动,推动城市化进程(王桂新, 2012; 周文等, 2017; 向晶等, 2018)。另一种观点则立足农民城市

^{*} 感谢夏柱智、陈文琼博士以及评审老师为本文提供宝贵的修改建议

① 国家统计局 2018 年人口普查数据 <http://data.stats.gov.cn/easyquery.htm?cn=C01>

② 2019 年 6 月中国社会科学院财经院创新工程重大成果《中国城市竞争力第 17 次报告》http://www.cssn.cn/zx/201906/t20190624_4922401.shtml

化的主体性与能动性,认为农民城市化实践关键不在于体制、制度问题,而在于农民家庭的理性化选择。农民城市化是农民根据其家庭理性自主实现的城市化(王海娟,2015)。基于此,以代际合力为基础的半工半耕家庭生计模式成为农民城市化的成本分担和实践机制,由此形成农民城市化的特殊模式:就近城市化(陈文琼等,2018)和接力式进城(张建雷,2017)。基于代际支持的接力式进城和就近城市化实践的是半城市化,这种半城市化并不是制度问题,而是城市化发展的必然过程,是农民出于经济理性的策略选择。因此,中国城乡二元体制并非农民城市化的制度障碍,相反其作为保护型结构是农民进城的巨大制度红利(贺雪峰,2014),农民在城乡之间进退有据的弹性城市化,是防止城市贫民窟、保持城市化稳健有序的根源(廖桂蓉,2009;王德福,2017)。

既有研究比较清晰地梳理了农民城市化的内涵、问题及其实践路径,并伴随着研究争论不断将研究视阈从宏观体制层面转向微观个体层面,强调农民城市化的“阶层主体性”(夏柱智等,2017)。延续此路径,本文立足农民城市化的家庭理性,从微观层面总结农民城市化实践类型。但是与既有研究不同的是,本文并非基于实然意义上将农民城市化视为自在主体,默认农民进城的必然性,进而探讨其城市化实践的外在条件或内在推动,这显然忽视了农民城市化的意愿问题。城市化虽然是经济发展和社会转型的必然趋势,但农民是否城市化不仅取决于客观的城市化发展水平,也取决于农民

家庭的进城意愿,这是农民城市化的根本动力之一。客观上,农民的城市化意愿受个体、家庭、村庄和城市等多重因素的影响(毛新雅等,2016),根本上是外生城市化发展的吸力和内生社会文化结构的推力共同塑造的(陈扬乐,2000)。基于此,本文将农民视作城市化自为主体,一方面关注农民城市化的主观价值取向,而非单纯立足于农民的进城能力及其融入程度;另一方面从农民家庭而非农民个体角度出发,农民城市化意愿是家庭整体意愿。与西方核心家庭形态不同,中国家庭在“恩往下流”的儒家伦理价值观念主导下是以子代核心家庭为发展目标的整体性家庭,因此农民城市化是以家庭为基本单元的(朱灵艳等,2019),农民城市化意愿离不开家庭发展意志。

质言之,本文以农民家庭为分析单位,从家庭自主性层面厘定农民城市化意愿,并将其放置在农民城市化能力的实践经验中,基于二者的互动,探究农民城市化的实践类型及其基本样态。本文可能的创新之处在于:首先,引入家庭自主性视角,将农民城市化意愿纳入农民城市化实践中,拓展学界关于城市化研究的理论视野;其次,立足经验分析,通过农民进城意愿及其能力的双向互动进行类型建构,丰富农民城市化的实践类型,为中国城市化政策制定提供参考。本文的经验材料来源于笔者与所在团队于2016年至今在各地农村展开的田野调查,文章即是在多次、多点调研基础上形成的关于农民城市化问题的集中性思考。

二、分析框架:家庭自主性视阈下的农民城市化

改革开放以后,伴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农民进城的制度性障碍越来越小,一方面进城务工的机会越来越开放和充裕,另一方面户籍制度的红利也相对减少,相反在乡村振兴战略下,附着在集体土地成员权基础上的农村户籍反而更具诱惑力,城乡二元结构从剥削走向保护(贺雪峰,2014)。由此,农民城市化不是简单的制度和政策问题,而是家庭和经济问题,是农民基于家庭自主性及其经济理性的策略选择,因此城市化研究不能忽视农民家庭自

主性。在农民城市化进程中,家庭自主性不仅包括农民家庭在家庭发展能力限度内的理性调试,也包括其在家庭发展目标驱动下的主体选择,这就对农民城市化的能力和意愿提出了要求。当前学者更为关注前者,即基于体面城市化*的进城目标,探究农民如何实现城市化。但是农民城市化的能力能否被充分激发和彻底转化往往取决于其城市化意愿。因此本文试图从农民城市化的意愿和能力两个面向探讨其城市化的实践类型,并结合家庭进

* 体面城市化即是建立在稳定就业基础上的体面的城市居住和城市生活

行细致分析。

(一) 家庭发展目标与城市化意愿

城市化意愿是农民进城的面向和驱动力。学者一般从自上而下的外在动力机制将农民城市化意愿归结于宏观经济发展,认为城市工业部门创造的充裕就业机会及其高工资对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吸纳是驱动农民城市化的主要动力源(王桂新, 2013)。这显然忽视了自下而上的内在机制,农民城市化作为家庭自主性城市化,其进城意愿不仅源自外生力量,也源于内生力量,本文称之为家庭发展面向。家庭发展面向取决于家庭发展目标,家庭目标越是发展性的,也即越是以向上流动为目标,其城市化的意愿相对就越强,反之则越弱。

中国农村社会结构具有明显的区域差异(贺雪峰, 2012),不同村庄社会结构和文化特质不同,家庭发展目标也不同,大致可以分为两类:第一类是以阶层流动为家庭目标,此类家庭本文称之为发展型家庭,其主要分布在长江中下游平原和华北平原村庄,典型如长江三角洲(以下简称长三角)发达地区农村和江汉平原、华北平原普通农业型村庄。位于长江中下游平原的中部农村社会结构比较分散,在现代性力量的冲击下,农民生活和意义面向容易发生转变,家庭发展面向向外,家庭进城意愿很强。笔者于2017年12月、2018年9月分别在浙江上虞兴村*和皖南寒村调研,两村的进城买房率分别高达50%、90%;位于华北平原的北方农村村庄内生规范较强,代际伦理责任也相对厚重,村民具有很强的人生任务观念。但是随着城市化对年轻群体的吸引及其与子代婚姻的捆绑,强化父代责任的同时,激活村庄竞争,激发了本地家户的城市化面向。

第二类是以社会生活为家庭目标,本文称其为生活型家庭。这类家庭集中在南方宗族型村庄和西南边陲农村,典型如广东、福建、赣南、贵州、云南等地,其中宗族型村庄具有笼罩性的宗族认同结构,抵御现代性力量的侵入,因此宗族内部“尊尊,亲亲,父父,子子”的伦理价值没有完全断裂,代际责任向上反馈更多,子代成婚、买房都不是父代的刚性责任,家庭目标相对分散,城市化目标不凸显,

农民进城意愿不强。而处于儒家文化圈边缘的西南边陲地区,接受儒家文化的浸染较小,家庭内部的价值伦理观念较弱,家庭发展基本围绕日常生活展开,进城意愿很低,在贵州调研时进城买房的农户反遭大家嘲讽和排斥。

简言之,农民的城市化意愿是由其家庭发展目标推动的,围绕着阶层流动和社会生活展开的农民家庭目标,其城市化意愿是依次降低的。

(二) 家庭发展能力与城市化能力

立足于家庭发展,农民进城能力取决于其家庭发展能力。家庭发展能力是完成家庭目标、实现家庭继替的能力,这其中既包括家庭生产发展能力,也包括家庭抵御风险能力。阚兴龙等(2019)将家庭发展能力操作为家庭经济发展能力、家庭人口再生产能力和家庭生活发展能力三个子系统,强调家庭人口再生产能力对家庭发展能力的影响;吴帆等(2012)将家庭发展能力视为家庭资源满足其成员生活和发展需要的能力,包括六个方面,但是伴随着家庭供求均衡机制的失衡,家庭发展能力亟需政策支持。这本质是二元视阈下的分析,因此家庭发展能力需要外力助推,但实际上家庭发展能力不仅包括外生资源禀赋,也包括家庭内部策略及其功能组合,家庭发展能力是由家庭禀赋、家庭功能和家庭策略组成的(石智雷, 2014)。李永萍(2019)进一步细化为家庭资源、家庭结构和家庭目标,从家庭内部的能动性出发阐释家庭的发展能力。基于此,本文从家庭自主性出发,将家庭发展能力操作为家庭资源充裕程度和家庭代际合力程度,前者是家庭发展能力的经济基础,更多取决于半工半耕的生产力,后者是家庭发展能力的关系基础,包括家庭劳动力的整合程度及代际支持力度。

首先,资源充裕程度一方面受制于土地资源,另一方面受制于市场资源,也即半工半耕结构。从“耕”的层面看,人均所拥有的土地资源数量及质量决定其农业收入水平,人均耕地面积较多且土质肥沃的情况下,农业的生产性收入就相对较高,从而形成家庭资源积累的一部分;反之,农业则只扮演糊口角色,无法转化为家庭发展能力。从“工”的层面看,在务工收入远高于务农收入的情况下,

* 按照学术惯例,文中所涉地名、人名等均做匿名化处理

务工机会越多、水平越高,家庭的发展能力也越强,反之则越弱。在市场作用下,农民务工水平^{*}受制于两个因素:一是距离市场的远近,二是市场就业机会的充裕程度。距离市场越近且市场机会越充裕的地方,劳动力务工成本低且可实现充分就业,其务工水平就相对更高,家庭发展能力也就更强,反之则较弱。

其次,代际合力程度取决于家庭关系结构,这是由家庭伦理责任塑造的。家庭劳动力的整合一定程度上意味着家庭劳动力调动的充分程度,家庭劳动力整合度越高,其劳动力资源越被充分调动,代际支持的力度也越大,家庭的发展能力也相对越强,反之则越弱。一般而言,代际责任愈是刚性的,

代际整合和支持的力度就越大,反之,弹性代际责任下代际整合和支持力度具有可收缩的空间,家庭发展能力相对就是不完全充分的。

概述之,立足于家庭自主性,农民城市化能力受制于家庭发展能力,而家庭发展能力又取决于家庭资源的充裕程度和代际支持的合力程度,家庭资源越充裕、代际合力程度越深,家庭发展能力就越强,农民城市化能力也就越强,反之则越弱。

(三) 农民城市化的实践类型

农民城市化的实践是其意愿和能力综合作用的结果,根据城市化意愿和能力两个面向可以将农民城市化建构为四种理想类型(见表1)。

表1 农民城市化的四种类型

意愿水平	城市化能力强	城市化能力弱
城市化意愿高	完全城市化	半城市化
城市化意愿低	逆城市化	去城市化

从表中可以看出,当农民进城的意愿很高、城市化能力也很强时,其城市化实践即是一种完全城市化,典型如城郊农村基于城市土地扩张实现的就地城市化与长三角发达地区基于农村城市化工业发展和本地就业实现的高水平城市化(褚明浩,2019)。当农民城市化意愿很高但其进城能力在资源结构等的限制下难以高水平发挥时,其城市化的实践则是一种半城市化,这是一般中西部农业型村庄农民城市化的普遍样态,也是学界关注的重点(王春光,2006)。与之相反,当农民城市化意愿较低时,也存在两种情况:一种是其城市化能力相对较强,这种农民具有一定的逆城市化^{**}倾向,典型

如珠江三角洲(以下简称珠三角)地区地租经济加持下的部分农村(李翠玲,2011);另一种是农民城市化意愿不高,进城能力也不强,典型如贵州、云南等地,这部分地区农民具有去城市化的面向。

上述作为一般意义上的城市化类型建构,可以相对直观地了解农民城市化的实践样态,但是作为理想类型的建构,其在实践经验中是如何呈现的还需进一步细致挖掘。由此,本文以家庭自主性为分析视角,结合农民家庭的实践经验,通过对农民城市化意愿及其能力的双重分析,探究不同城市化意愿下基于城市化能力差异所形塑的农民城市化类型及其实践机制。

三、发展型家庭农民的城市化实践

发展型家庭以阶层流动为家庭发展目标,无论是出于主动选择还是基于被动裹挟,现代性压力的进入激活了农民的城市化面向及其动力,因此农民

城市化意愿相对较高,但是其所拥有的城市化能力具有差异,根据农民城市化能力的高低可以将发展型家庭的城市化分为完全城市化和半城市化。下

* 此处为便于分析,假定农民劳动力素质相同,其务工水平的差异则主要是市场因素

** “逆城市化”一词源于西方,是指在“大城市病”下经济条件较好的中上层乃至上层人口倒流至郊区或农村的现象,是城市分散化、郊区化现象。作为植入概念,中国学界对其看法不一,争议较大。本文所指的逆城市化仅仅从人口逆向流动角度出发,指有能力进城却不愿意进城的人口逆流现象,典型如珠三角农村年轻群体生产生活从中心城市转移到本地小城镇,户籍也存在农转非等现状

面以农民城市化能力较强的长三角发达地区农村和农民城市化能力相对较弱的江汉平原、华北平原普通农业型村庄为例,分析同为城市化意愿较高的村庄的农民城市化实践的差异。

(一) 长三角发达地区农民的完全城市化

长三角发达地区农村工业化起步早,村庄社会结构遭遇市场和现代性力量的冲击较大,在城乡一体化背景下,农民家庭发展目标向城市看齐,城市中产生活成为年轻群体城市化的根本动力。以苏南为例,苏南的工业化模式是从资本运营型的集体企业转向资产运营型的招商引资,形成的是以集体土地租赁为基础的新型集体经济,其集体资源基本统筹掌握在地方政府手中,农民以土地换社保的方式全部嵌入市场经济体系中,因此城市中产目标的实现依赖劳动力就业。本地围绕劳动力素质差异产生了一定的社会分化,劳动力素质较高的群体进入大企业的管理岗位、实现体面就业并顺利成为城市中产阶级,由此对其他家户产生带动效应,农民城市化意愿很高,在就地工业化基础上农民城市化的能力也很强。

1. 就地工业化与三代全务工模式。长三角经济发展为本地村民带来巨大市场红利,其核心区域基本实现了从农业向工业的转型,就地工业化是多数长三角发达地区农村的经济形态,这为本地农民提供了充裕的就业机会。在本地工业化基础上充分发达的经济体系塑造出本地完整产业链,不仅发育出正规就业市场,也伴生诸多非正规就业市场,这种多层次就业吸纳农民充分就业。不仅如此,嵌入到长三角沿海经济开发区和发达城市群中的本地经济,基于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发展,尤其是在政府主导下的产业梯度转型升级中,具有很强的可持续性,这也保障了本地村民就业的稳定性与持续性(朱战辉,2019)。笔者2016年7月在苏南项村调研时,村级工业总产值15亿元,规模较大的外企有7家,其余大大小小的民营企业有198家,全镇企业数量更多,仅上规模的外企就有50多家,这无疑为本地创造了丰富的就业机会。按照“老年人—中年人—年轻人”三代计算,本地三辈群体基本全部嵌入务工体系中,其中青年与中年一代以正规就业为主,具有稳定的就业收入和社会保障,老年人则以非正规就业为主,由村庄购买的城镇社保兜

底,三代人全部实现务工和保障,满足基本生活需求的同时,塑造出家庭强有力的发展能力,在社保加持下,本地农民进城能力很强。

2. 弹性代际合力的激活与强化。从社会结构看,长江中下游地区整体而言属于分散型的原子化村庄,代际责任有限,尤其是伴随着老人经济的独立,代际自主性很强。但是城市化压力下,高额房价和中产消费水平使得年轻一代很难实现独立进城,倒逼父代资源不断集聚输入子代家庭。苏南甚至出现一个老人一天打三份工的情况,按照当地父母的说法“老人给子女钱想让子女过得好一点,与别人家孩子相比要跟上去,跟不上,补贴补贴稍微好一点。”可见,在城市化发展目标下,家庭弹性的代际合力被重新激活,在激烈的阶层流动竞争中,代际之间的合力不断被强化,家庭并没有因为经济水平的提高出现典型的核心化,反而形成“新联合家庭”(齐燕,2019)。家庭劳动力的充分调动与整合以及代际之间的有力支持构成当地农民实现城市化的家庭关系基础。

因此,充裕就业机会下的三代人全务工模式与城市化压力下较高的代际合力水平,大大增强了本地农民城市化的能力,在城市化面向的强力吸引下,本地农民形成了建立在就业基础上的完全城市化实践样态。

(二) 中部、华北平原区普通农业型村庄农民的半城市化

位于长江中下游平原的中部普通农业型村庄的典型代表是江汉平原农村,华北平原农业村典型如河南、皖北、山东等地部分村庄。两类平原村资源条件相近,城市化能力相当。从村庄社会结构和家庭发展目标看,二者又略有差异,前者更重视教育,后者更重视婚姻,但是现代性的冲击使其在结果上趋于一致,即家户都具有较强的城市化面向。其中,江汉平原隶属长江中下游,村庄内生结构相对松散,遭遇市场经济和现代性的洗礼明显,村民意义面向容易变动,从而产生对现代性生活的追求。华北平原村庄内生结构相对较强,代际责任厚重,家庭发展目标围绕人生任务展开,但是与城市化捆绑的子代婚姻压力和村庄竞争压力倒逼其也转向城市化,流动意愿较强。然而受制于市场资源约束,这些地区农民城市化只实现了就近半城

市化。

1. 半工半耕结构与农村支持城市模式。打工经济的兴起使得中西部普通农业型村庄基本形成了以代际分工为基础的半工半耕家庭生计模式。在“耕”的层面,人均耕地面积较多的江汉平原农业剩余收入相较于人地关系紧张的华北平原要更多,其不仅可以满足家庭基本生活消费,还产生一定结余。但是整体而言,农业收入更多是补充性的,并不是家庭财富的主要积累源泉。在“工”的层面,三代家庭中,年轻一代是完全嵌入市场经济体系中的,中年一代根据其劳动力生产周期和家庭生命周期逐步从务工市场退回,在村形成以务农为主、副业或打零工等为辅的兼业模式,老年一代则基本进入退养状态。本地就业机会的稀缺,使得家庭劳动力无法全部被市场吸纳,而一般农户在全国劳动力市场竞争中的优势不大,故而通常以低端劳动力市场为主,收入不高,也没有社会保障,异地务工的生活成本也更高。因此农户整体性的家庭发展能力受到限制,只能通过半工半耕的双重收入,形成农村对城市的支持,支撑年轻一代的城市化生活,实现接力式进城。

2. 城市化压力下的代际捆绑。江汉平原作为原子化村庄,代际关系具有弹性,父代对子代虽负

有一定的人生任务等责任,但其责任不是刚性的,根据父代能力尽力而为。现代性力量的进入打破了这一弹性代际关系的平衡,尤其是伴随子代教育和进城买房压力的增大,父代被捆绑进子代的家庭发展中。在城市化竞争中,父代并不能心安理得地享受,而倾向于为子代不断地输入资源,代际合力较强;华北平原农村代际关系厚重,代际责任刚性,家庭发展目标围绕人生任务展开。随着全国婚姻市场的开放与竞争,在性别资源严重失衡的本地婚偏好下,本地形成了刚性的女性婚姻要价市场,婚姻成本不断攀升且日益与城市化捆绑在一起。与城市化捆绑的婚姻作为父代的刚性责任,倒逼父代不得不高度调动其劳动力,甚至以自我剥削的方式完成家庭的基本再生产(韦艳等,2017),代际整合程度很深,代际支持的力度也极大。

由此,以江汉平原和华北平原为代表的中部和北方普通农业型村庄,在现代性压力冲击下,家庭内部形成以教育或婚姻为导向的城市化目标,农民进城意愿被充分激发,城市化动力很强;同时城市化的竞争与压力也倒逼代际关系的捆绑,代际整合和代际支持力度很大。但是在半工半耕资源结构的束缚下,本地农民家庭实现的是接力式的半城市化。

四、生活型家庭农民的城市化实践

生活型家庭是以日常生活为导向的家庭,家庭发展目标相对分散,父代人生任务观念也不重,典型如南方宗族型村庄和西南边陲地区。南方宗族型村庄虽然具有传宗接代的任务,但这一任务并未与婚姻捆绑,大家庭中只要有一个儿子生男即可,宗族认同的强大拉力也没有催生出较强的城市化流动面向;西南边陲地区受少数民族文化影响,农民注重当下的生活享受,村庄地缘社会互助共同体的吸纳使得村民进城意愿也不强。以下选取珠三角发达农村与贵州农业型村庄作为典型代表,分析同样是城市化意愿较低的生活型家庭,其基于进城能力的差异实践何种城市化样态。

(一) 珠三角农村地租经济基础上的农民逆城市化

珠三角发达地区农村作为宗族性村庄,市场经济的冲击虽不同程度地弱化宗族内涵,但其底色仍

然保存。以广东佛山高村为例,高村有三个自然村,每个自然村都是单姓村,都有自己的祠堂,市场经济冲击下本地宗族所蕴含的本体性价值明显衰落,村民已然分不清其宗室脉络。但是具有社会性价值的宗族文化观念和秩序得以保存,典型如人情规范和代际规则仍然遵循传统宗族逻辑,这得益于本地市场经济带来的不是压力而是红利。在市场经济红利和宗族结构保护下,村庄内生无压力,农户生产生活面向向内,城市化意愿不足(王华,2009),经济优势并未转化为较高的城市化水平,反而呈现出逆城市化倾向。

1. 半工半租结构与两代人务工模式。珠三角的工业化是依托区位优势发展的三来一补招商引资经济,本质是通过开发土地发展地租经济,但其地租经济的80%收益按照成员权进行股权量化和分红,归私人农户所有。以高村为例,高村作为发

展相对落后村,集体分红每人平均 3000 元/年,全镇分红平均在 5000 元/年/人,最高达到人均 1 万元/年。除此外,本地招商引资的企业基本是以劳动密集型产业为主,对劳动技术要求不高,因此充分吸纳本地人就业,中、青年两代人基本全部嵌入务工市场,个人的务工收入虽然不高,但是全家务工收入不低,高村家户年均收入不低于 10 万元。不仅如此,作为劳动力流入地,本地农户还通过“种房子”发展出租屋经济,因此本地家庭形成半工半租的生计模式。半工半租结构为本地农民创造了充裕的资源基础,家庭发展能力较强,客观意义上农民的城市化能力较强。

2. 无压力结构中低度的代际支持。珠三角农村虽然工业化起步早,但村庄并没有产生明显地经济和阶层分化。这与本地工业化发展路径有关,本地三来一补的外资经济是出口经济,留在本地的经济剩余不多,且外资经济以外地老板为主,本地内生发育的老板不足,村民多是嵌入到本地外来企业中获取平均工资,村庄内部经济分化很低;宗族型村庄的保护性结构也抑制村庄内部的分化竞争,典型如村庄社会没有边缘人;宗族认同下的大家庭也是互助的,家族内部助强扶弱,是去分化和无压力的结构。此外,在本地区位优势下子代结婚不成问题,婚姻成本也不高,地租经济福利吸纳下年轻人生产生活面向向内,个体也没有买房压力。因此,本地社会是一个无压力结构,村庄无压力,家庭无压力,个体也无压力。在此无压力结构中,家庭目标较易完成,代际合力未被调动,代际支持的力度也因此有限,只在日常生活层面进行一定的补给。在宗族文化和土地资源把控下父代具有一定权威,父代的劳动力配置更多取决于自己而非子代家庭,因此家庭劳动力配置的程度也不深。

总之,珠三角农村在半工半租经济结构下,家庭发展能力不弱,但是地租经济的保障也导致本地农户进城意愿不高,村庄福利远高于城市的条件下,农民没有很强的进城动力。在无压力结构中,代际支持力度较小,家庭劳动力配置也不充分,甚至产生一定的劳动力逆市场化倾向,年轻群体愈发青睐轻松的低收入工作,闲暇时间以外出旅游为

主,生活具有很强的消遣性,家庭的积累面向不强。较高的家庭发展能力并未转化成有效的家庭积累能力,也未激活城市化,本地村民是逆城市化的。

(二) 西南边陲地区农民的去城市化

西南地区在政治、经济乃至文化意义上都是典型的边陲地区,其边陲性塑造出本地内生的经济社会文化结构。以贵州为例,贵州多山区,人均耕地面积不多,土质也较贫瘠,是全国重点扶贫地区。早期生存环境和资源条件相对较差,农民因此对村庄地缘共同体的依赖性很强。在辛苦劳作与少数民族文化影响下,村民生活以村庄内部欢愉为主,注重日常生活的消费享乐。没有人生任务的代际责任,也没有进城的意愿,家庭发展能力也较弱,现代性力量并没有真正改变其生活惯习,其仍然遵循去城市化的内向型生活面向。

1. 弱半工半耕结构与夫妻兼业模式。市场经济的发展带动了家庭生计模式的改变,西南边陲地区也形成半工半耕结构,但是当地的半工半耕结构是以夫妻分工为基础的,家庭劳动力配置并不充分,半工半耕的经济积累也相对有限。以贵阳中村为例*,中村人均耕地虽有 1.01 亩,但是全村属于浅切割中山丘陵坝子地带,土地极为细碎,且受喀斯特地貌影响,灌溉水容易下渗,水稻难以耕作,只能以旱地为主。打工经济兴起后,本地土地开始大面积抛荒,少数种植烤烟、果树的群体收入也相对有限,因此,本地农业很难产生有效的经济剩余。本地务工也具有显著的当地特点:一是以夫妻分工为主。年轻丈夫在外务工,妻子则主要负责照顾家庭和小孩,夫妻分工下家庭的劳动力没有最大化释放,全家只靠一个壮劳力负担,家庭积累能力较低;二是倾向于非正规就业。本地人偏好自由的工作,非正规就业成为其首选,但是就业的非正规性导致工作的不稳定,自主创业的形势也不容乐观(刘静荣 2020),“挣快钱”下务工的有效积累也不充足。在有限的家庭发展能力下,本地及时性的消费面向——“先消费、后挣钱”、“赚得快,花得凶”,使得有限的家庭资源也难以转化为较强的城市化能力。

2. 生活社会中松散的代际合力。西南边陲农村家庭没有明确目标,农民的生活面向很强,尤其

* 感谢肖琳为本文提供宝贵的调研材料

是在饮食消费上,农民没有节俭意识,家户肉菜基本不断,每年负债也要吃年猪。同时,农民的生活是享受型的,以中村为例,当地家户极为注重休闲娱乐,家中的现代化电器,乃至麻将桌、音响设备等齐全;且每家都有小车,或借贷或二手;再者,本地人喜欢社会交往,朋友之间也经常聚餐。这种享受型生活以家庭的资源汲取能力为基础,导致家庭资源消耗在日常生活消费中。但是本地代际关系稀薄,代际责任不重,子代教育和结婚压力并未转移给父代,结婚是子代个体的事情,父代普遍“不操心”,本地结婚成本也不高。即便家庭发展压力相对较大,也并不影响个体对享受型生活的追求,家庭资源优先满足个体当下需求。在此享受生活型

的社会中,家庭发展目标是弥散的,代际关系极为松散,代际支持力度很弱。

低度的资源结构和文化结构塑造下,西南边陲地区半工半耕的生产力较弱,代际整合力度较小。村民没有家庭发展意识,家庭有限资源均用于日常消费。村庄内生去竞争性、无压力,此类低消费、高福利的村庄社会生活对村民具有很强的吸引力。因此,年轻人进城意愿很低,中村全村进城买房率不超过 15%。进城能力有限、进城动力不足使得本地农民去城市化。

综上,不同城市化意愿下农民家庭发展动力不同,基于农民城市化意愿及其能力的双重互动,农民的城市化表现为不同的实践类型。具体见表 2。

表 2 中国农民城市化的实践类型

城市化意愿水平	家庭类型	区域比较	家庭目标	家庭资源配置	家庭生计模式	代际合力	城市化能力	城市化实践
高	发展型家庭	长三角发达地区农村	城市中产	教育、买房	以代际分工为基础的三代人务工	较高	强	就业导向下的完全城市化
		中部、华北平原区普通农业型村庄	进城流动	教育、结婚、买房	以代际分工为基础的半工半耕	较高	一般	教育、婚姻导向下的半城市化
低	生活型家庭	珠三角发达地区农村	享受生活	休闲旅游	以代际分工为基础的半工半租	较低	较强	村庄福利笼罩下的逆城市化
		西南边陲普通农业村庄	享受生活	生活消费	以夫妻分工为基础的半工半耕	低	较弱	社会生活吸纳下的去城市化

五、结论与讨论

个体与社会、行动与结构往往是相互形塑的,现代社会的转型尤其是现代性力量的进入,推动个体不得不进行适应性调整;但是在此过程中,结构的影响并不是绝对的,个体行动具有自为自觉性,其不仅会根据现实社会结构迅速作出反应,同时也会基于自身理性选择能动性予以应对。由此,城市化研究不仅需要关注客观的城市化能力,也应该重视个体主观的城市化意愿,农民城市化不仅仅取决于城市化的客观发展水平及其城市化能力,也受制于家庭的城市化意愿及其进城动力。基于此,本文从农民城市化的意愿和能力双面向出

发,立足家庭自主性视角,根据家庭发展目标区分农民城市化意愿的高低,并由此将农民城市化意愿较高的家庭视为发展型家庭,与之相反的则是生活型家庭,进而以农民家庭为分析单位,立足实践经验,通过城市化意愿及其能力的双重互动探究农民城市化的实践类型与机制。

城市化作为国家发展的重点关注领域,2020 年《政府工作报告》进一步提出要深入推进新型城镇化建设,尤其指出要“增加就业”、“因城施策”^①。基于此,在城市化的现代进程中,中国的城市化政策首先要分区域、分城市、分类型有序展开。中国

① 见 2020 年《政府工作报告》http://www.gov.cn/zhuanti/2020lhzfzgbg/index.htm?_zbs_baidu_bk, 访问时间: 2020 年 6 月 4 日

村庄存在显著的区域差异,从经济发展和社会分化角度可以分为东部发达农村和中西部普通农业型村庄,不同类型地区农民家庭发展能力不同,城市化样态也不同,因此国家要分类施策,精准有效地推动城市化发展。对于东部发达地区农村,就地工业化形塑了家庭较强的发展能力,通过城乡一体化乃至城市化扩张对农村进行吸纳具有现实基础;但是对于中西部普通农业型村庄,其城市化能力相对不足,农村对农民进城而言还发挥重要的支持和保障作用,这类地区不宜推行过于激进的城市化政策,而应尊重农民家庭的自主性,遵循渐进的弹性城市化道路。其次,农民城市化是农民家庭的理性选择,应立足农民家庭自主性,增强家庭发展能力。

在此意义上,中国的城市化不能像西方一样推行“去家庭化”的政策。相反,在中国“家本位”伦理统摄下,应推行强化农民家庭功能的城市化发展政策和目标(陈卫民,2012)。尤其是地方政府应维持基本社会秩序,引导村庄实现公序良俗,为农民城市化发展和现代性转型提供基本秩序保障。此外,城市化可持续的关键在于稳定的城市就业及其社会保障,这是避免城市贫民窟出现的重要基础。当前中西部一般县城工业稀薄,就业吸纳能力相对有限,如何提升其就业水平是县域城镇化的长效机制。这就需要发挥中心城市的辐射带动作用,加大对城市工业、企业的培育和扶持,激活城市经济发展,增加城市就业,真正推进人的城市化。

参考文献

1. 文军. 农民市民化: 从农民到市民的角色转型. 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04(3): 55~61
2. 张耀宇, 陈利根, 陈会广. “土地城市化”向“人口城市化”转变——一个分析框架及其政策含义. 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 2016(3): 127~135
3. 王春光. 农村流动人口的“半城市化”问题研究. 社会学研究 2006(5): 107~122
4. 王桂新. 我国城市化发展的几点思考. 人口研究 2012(2): 37~44
5. 周文, 赵方, 杨飞, 李鲁. 土地流转、户籍制度改革与中国城市化: 理论与模拟. 经济研究 2017(6): 183~197
6. 向晶, 钟甫宁. 农村人口转移、工业化和城镇化. 农业经济问题 2018(12): 51~56
7. 王海娟. 人的城市化: 内涵界定、路径选择与制度基础——基于农民城市化过程的分析框架. 人口与经济 2015(4): 19~27
8. 陈文琼, 刘建平. 就近半城市化与去城市两级分化. 华南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8(6): 104~113
9. 张建雷. 接力式进城: 代际支持与农民城镇化的成本分担机制研究——基于皖东溪水镇的调查. 南京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7(5): 10~20
10. 贺雪峰. 论中国式城市化与现代化道路. 中国农村观察 2014(1): 2~12
11. 廖桂蓉. 弹性城市化: 中国转型期农民工反贫困的现实路径. 人口与经济 2009(2): 65~69
12. 王德福. 弹性城市化与接力式进城——理解中国特色城市化模式及其社会机制的一个视角. 社会科学 2017(3): 66~74
13. 夏柱智, 贺雪峰. 半工半耕与中国渐进城镇化模式. 中国社会科学 2017(12): 117~137
14. 毛新雅, 王桂新. 务工经历与农业人口城市化意愿——以中西部七省(市)为例的研究. 社会科学 2016(8): 82~93
15. 陈扬乐. 中国农村城市化动力机制探讨——兼论中西部加速农村城市化的战略选择. 城市问题 2000(3): 2~5
16. 朱灵艳, 曹锦清. 社会转型期的中国式城市化基本单元. 华南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9(2): 130~140
17. 贺雪峰. 城市化的中国道路. 东方出版社 2014: 106~108
18. 王桂新. 城市化基本理论与中国城市化的问题及对策. 人口研究 2013(6): 43~51
19. 贺雪峰. 论中国农村的区域差异——村庄社会结构的视角. 开放时代 2012(10): 108~129
20. 阚兴龙, 祝颖润. 改革开放40年中国家庭发展能力变化研究. 人口学刊 2019(4): 5~17
21. 吴帆, 李建民. 家庭发展能力建设的政策路径分析. 人口研究 2012(4): 37~44
22. 石智雷. 计划生育政策对家庭发展能力的影响及其政策含义. 公共管理学报 2014(4): 83~94
23. 李永萍. 家庭发展能力: 农村家庭策略的比较分析. 华南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9(1): 108~120
24. 褚明浩. 发达地区农民城市化的路径——本地劳动力市场和农民家庭策略的融合. 华中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9(5): 119~125
25. 李翠玲. 珠三角“村改居”与反城市化现象探析. 广西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1(2): 129~135
26. 朱战辉. 苏南水镇农民城市化的实践机制. 城市问题 2019(6): 30~36
27. 齐燕. 新联合家庭: 农村家庭的转型路径. 华南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9(5): 59~69
28. 韦艳, 姜全保. 代内剥削与代际剥削——基于九省百村调查的中国农村彩礼研究. 人口与经济 2017(5): 57~69

29. 刘静荣. 社会学视角的民族地区农民工创业研究. 农业技术经济 2020(1) : 143
30. 王 华. 广州城市化进程中郊区农民迁移意愿分析. 地理与地理信息科学 2009(2) : 75~78
31. 陈卫民. 我国家庭政策的发展路径与目标选择. 人口研究 2012(4) : 29~36

Family Autonomy and the Practical Type of Peasant Urbanization

LU Qingqing

Abstract: Taking farmer urbanization as the main body and based on practical experience ,this paper research the types of farmer urbanizatio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family autonomy.Based on the analysis of farmers' willingness to urbanize and their ability ,it is found that the development-oriented families with the goal of class mobility have a higher willingness to enter the city ,among which farmers in the developed areas of the Yangtze River Delta with strong urbanization capacity achieve full urbanization ,while the agricultural villages in Jiangnan Plain and North China Plain ,which are second in capacity ,have achieved only semi-urbanization; The willingness of living-type families to enter the city with social life is low ,among which the farmers in the developed areas of the Pearl River Delta have a typical tendency to counter-urbanization under the cover of the village welfare of the half-work and half-rent , while the southwestern border areas have low urbanization intention and ability.Peasants are integrated into daily life and manifested as de-urbanization.There are regional differences in the development of urbanization in China ,so it is necessary to take measures according to the classification and attach importance to the key role of farmer family in urbanization.

Keywords: Family autonomy; Willingness to urbanize; Urbanization capacity; Regional differences

责任编辑: 李玉勤